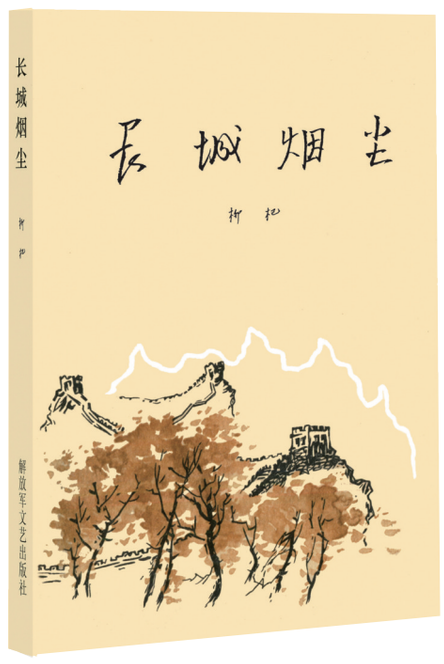
重点阅读

阅新版《长城烟尘》思念柳杞

□胡　可

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的日子里，时常回忆起当年经历过的敌后斗争和描写敌后战场的文艺作品。今年国庆节前，柳杞的女儿林爽爽带来新版的《长城烟尘》，令我激动兴奋不已。这部描写当年击毙敌酋阿部规秀的雁宿崖、黄土岭战役的小说，是柳杞同志的代表作品，是为庆祝新中国成立10周年、于1959年完成的。它比新中国成立初期问世的那批反映抗日战争的小说出现得晚，但出版之后即被人传诵，只是不久后就开始了“文革”，一切小说都成了禁书。此次这部作品的再版，既是对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的纪念，也是对刚去世的柳杞——这位睿智勤奋的老作家的纪念。

柳杞大我一岁，却早在上世纪30年代求学期间即为《大公报》副刊撰稿，显露出他的才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他奔赴延安，从陕北公学毕业来到敌后晋察冀军区，在一分区部队中长期从事宣传工作。《长城烟尘》这部小说是他对雁宿崖、黄土岭战役亲身经历的产物。他的另一部长篇小说《战争奇观》和中篇小说《山径崎岖》，也都是他当年在敌后战争环境中亲历亲闻的呕心沥血之作。我认识柳杞是在1956年，当年总政文化部一度把全军若干作家、美术家集中起来成立了一个创作室，我和杜烽、徐光耀由北京军区调来，柳杞、魏巍从《解放军文艺》副主编岗位调来。一年后，创作室撤销，调来的人员各回原单位。回到北京军区的四个人是柳杞、魏巍、杜烽和我，我们回到北京军区都分配了工作。四个人都是上校，分配的职务都是师级单位的副职。我被分配到河北省石家庄军分区担任副政委工作了4年，柳杞和魏巍并未到职，而是参加了北京军区战史编写组的工作，杜烽则留在北京继续完成他未完的剧作。1966年3月，总政召开了一个全军创作会议，我们作为北京军区的创作人员被指定参加。这时我们四个人作为单独的创作组，归军区文化部长刘佳领导。不久，以批判“文艺黑线”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便在军队文化单位首先爆发。北京军区文化部批判的重点是刘佳、魏巍、杜烽三人。那时各军区的文化部长都作为“黑线”的推行者挨整，刘佳在劫难逃；杜烽的代表剧作《李国瑞》被北京人艺重演，被指为“中间人物”论；出乎我们意料的是，写过《谁是最可爱的人》、十分关注青年人世界观人生观教育的魏巍竟成为重中之重。



我和柳杞接触最多的一段时间是“文革”的前期，我们虽然都被指为受“文艺黑线”毒害极深的人，却因“罪证”不多而暂时都没有受到批判。我们对文化大革命的拥护和不理解是共同的，内心的惶惑和郁闷是共同的。我们都是受党教育多年的人，但在当时的情况下，对发生在眼前的事情做到冷静判断和独立思考却是极难的。我们除写过小字报欢迎大家批评外，从未写过大字报发表意见。直到军区文化部运动的主持者要把魏巍作为敌我矛盾处理时，柳杞和我经过商量才决定在支部大会上提出我们的反对意见。这一表态使军区文化部的群众分成了两派而纷争不已并殃及他人。今天看来这只是“文革”中具体单位的芝麻大小事一桩，而十年“文革”已过去了半个世纪！当年的整人者、挨整者、整人又挨整者、挨整又整人者，都已去世多年，许多人都作出过贡献，往事已少有人提。

柳杞的《长城烟尘》是他回到北京军区以后，为迎接新中国成立10周年，接受军区的创作任务，根据自己亲历的雁宿崖、黄土岭战役而着手创作的。他在一篇记述《长城烟尘》创作经过的文章中，谈到他重回当年战地，并对有关人员进行访问、对有关场景再次进行回忆时获得的感受。旧地重游，故人重访，后来的经历使他对当年经历的生活在重温中得到认识的升华。当年熟悉的生活如狼牙山下父老乡亲的情谊，战争中乡亲们的支援、民兵的贡献，同志们同甘共苦的战斗情谊，这一切都与《长城烟尘》里的人物、故事衔接了起来。当年的生活体验，因得到长期从事文艺创作经验的烛照而重新获得了生命。这种感受使他在《长城烟尘》以后又创作了另一部长篇小说《战争奇观》和中篇小说《山径崎岖》，不久前他的散文集《九尽杨花开》也出版了。

柳杞同志在今年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的日子里与世长辞了。他将同他描写伟大抗日战争的多部作品一起被读者记忆，如永不消散的长城烟尘传之后世。

（《长城烟尘》，柳杞著，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15年出版）

书香茶座

又冒出一群人

□冯骥才

20年前，脑袋里忽冒出一群人物，全是我家乡天津卫的奇人异士。天津这块地里边，有碱有盐还有硝，因生出各色性格的人，又热又辣又爽又嘎又不好惹。因之，自儿时耳朵里就装满一群群乡土怪客与民间英雄，叫我称奇叫绝，心里佩服。我信——如果没这些人物，就不知道嘛叫作天津卫。

文化学者好述说一地的特征，写小说的只想把这一方水土独有的人物写出来，由此实实在在捧出此地的性情与精神，所以自从我写小说，此地的人物就会自个儿钻出我的笔管，然后一个个活脱脱站出来，独立成篇；一个人物一个故事一篇小说，反过来一篇小说一个故事一个人物。比如《俗世奇人》就是这种写法。

我喜欢这样的写法。好比雕工刻手，去一个个雕出有声有色有脾气有模样的人物形象。小说之所求，不就是创造人物吗？小说成功与否，往往要看掩卷之后，书中的人物能不能跑出来，立在书上。

《俗世奇人》成书前，先是以《市井人物》为题一组组刊在《收获》《故事会》及一些报纸上。后来集结成册，取名《俗世奇人》，凡18篇。出版后读者甚夥，有些篇章被选入教材。这一来，脑袋里还有一些没写出来的人物便闹腾起来，也要出头露脸，展现身手。近日得闲，一下笔又冒出一群津门奇人，数一数，恰好也是18个人物18个短篇。怎么正好也是18呢？别问我，我也不知。

如今这36篇的主人公站在一起，再加上众多配角，乱哄哄一大群。看上去，正是我心里老天津卫的各色人等。

若说地域文化，最深刻的还是地域性格。一般有特色的地域文化只是一种表象，只有进入一个地方人的集体性格的文化才是不可逆的。它是真正一种精灵。还有比《朝花夕拾》那些人物更鲜明的鲁镇，比《骑兵军》那些故事彰显得更夺目的哥萨克吗？

我承认，我是从文化视角来写这一组人物的。从年鉴学派的立场看，任何地域的性格，都是在其历史某一时期中表现得最充分和最耀眼；比如清末的北京、三四十年代的上海和清末民初的天津。我前后所写的这36个人物，都在清末民初同一时代，所以这些新写的人物仍然使用原名——《俗世奇人》，只在后边缀个“贰”字，以区别前后而已。

若君问我还会接着写下去吗？这由不得我，就看心里边那些没有写出的人物了，倘若哪天再有一群折腾起来，叫我不宁，自会捉笔再下。

（《俗世奇人 贰》，冯骥才著，作家出版社2015年11月出版）

■开卷絮语

桥上的脚步，桥下的水声

——读陈奕纯散文《激情燃烧的汀泗桥》

□石玉奎

打开《永远的沙家浜精神》一书，陈奕纯的散文《激情燃烧的汀泗桥》一下子跃入我的眼帘。

在文学的美丽长廊中，如果有一座桥能够因为作家激情洋溢的文字而成为一部史诗，那便是陈奕纯笔下的汀泗桥了。

这座桥，穿越了历史时空的更迭变幻，在不同事件、不同角色的纷繁较量中，默默承受血雨腥风，静观世事人心，而它自己的表情和心事，都化成坚韧、勇毅和果敢的民族性格，书写于历史的每一个枝节和叶脉。陈奕纯从历史的重大转折中，顺手拈来在北伐战争中争取民主与独立的铁血之战，抗日战争中切断日军供应的生死之争，我党为保卫胜利果实清肃反革命余孽、平息派系争端的壮士断腕，以此组成了汀泗桥饱含泪水和沧桑心路的一砖一木。陈奕纯的散文向来不落窠臼，在这篇散文中更是如此。他并不刻意渲染发生在汀泗桥上的历史场面的浩荡，也不偏执于历史细节的铺陈，而是从千年时空的缕缕回响中，提炼出百折不挠的意志和图腾，弘扬人心之善、人性之美，颂叹军民鱼水之情以及由此积淀而成的历史基石，支撑起一方水土、一个民族的精神脊梁。这也恰是这篇优秀散文的灵魂所在。

并不是所有的历史都是苍凉，并不是所有的故事都必然悲怆，汀泗桥如是，陈奕纯的文字亦如是。透察陈奕纯的文字，我们可以感受到沉重、厚朴、壮阔之美。更重要的是，在这篇9000多字的长文中，还可以让我们感受到文化散文的另一种美，比如桥上的脚步声、桥下的流水声。细细观察和体味这些带有异质特禀的散文符号，可以看出这些特质与陈奕纯散文创作一向秉承的独特趋向，共属于同一个生命的源头，那便是对真善美的孜孜追求，对中国梦的艺术表达。长文中构建出的汀泗桥镇现代工业、农业和城镇化的蓝图和规划，勾勒出的具有强烈的市场经济意识和发展意识的农民代表，是对中国梦的最好注解。这些脱离了说教和虚夸的散文形象，从另外的角度和视野，延展了时空经纬和人文情绪的纵深，拓宽了当代散文形象塑造的宽度和各种可能性。

陈奕纯的散文视角是宽度、深度和精度的完美结合，《激情燃烧的汀泗桥》也便成了可以多角度审视和评析的作品，带有历史传承的古老风貌，也有现代意识的激情燃烧。这份激情，是陈奕纯散文散发出的美丽气息，也是追梦人永不疲倦的号角和战鼓，擂响苍茫大地。

（《永远的沙家浜精神》，徐忠志、张建国主编，作家出版社2015年9月出版）

■新知新思

酷恋，或出没于伟大的江南

□何言宏

余为北人，却钟情于“伟大的江南”。“伟大的江南”是诗人柏桦的一个说法，我和很多人一样，对柏桦的说法尤有会心。伟大的江南孕育与体现了我们中华文化与中华文明的伟大与辉煌，复又具有独步天下的精致与美丽。但是她的精美和她疆域的有限，却又很容易让人忽略其伟大。所以，柏桦的说法，仿佛重新唤醒了我们关于江南的伟大记忆，让我们缅想，也让我们流连。

龚璇诗集《江南》中的诗，便是这种缅想和流连的思绪与印迹。不过与柏桦，也与我们很多人所不同的是，龚璇于江南并非外人，他是一位道道地地的江南人氏。自古而今，人们对于“何谓江南”和“何处是江南”其实并无一致的看法，人们至今也未为江南确定好一个具体的疆域。不过在另一方面，在关于江南区域问题的种种歧见中，以明清时期的“八府一州”即江宁府、镇江府、常州府、苏州府、松江府、杭州府、嘉兴府、湖州府和太仓州作为江南最基本的区域或核心地带，倒是一个共识。而龚璇，就生活和工作于其间的“太仓州”，太仓人氏也。在这样的意义上，正如他在诗歌中所表现出来的，他对江南的“酷恋”，就很自然，而且也正宗。

龚璇的诗集起初名为《恋爱中的江南》，后来索性就改为《江南》。在他起初的想法中，我很理解他的感情。他以往的几部诗集，先是叫做《或远，或近》，显犹疑；接着又叫《冷眼看花》，蛮矜持；但是到得第三部诗集，他的感情就变得有点“把持不住”，《风月无边》了。“风月无边”的状态中，人的感情最容易奔放，也最易迷蒙，因此他的第四部诗集，干脆就叫了《燃烧·爱》。龚璇对人生、对世界、对友情、对爱情，还有对他生长于斯的伟大的江南，都有深挚刻骨的感情，无论是他“或远，或近”地“冷眼看花”，还是他在“风月无边”后的“燃烧”与“爱”，他的根柢，他的精神深处最为核心的方面，其实全都是“爱”。没有“爱”的驱动，没有纯粹的“爱”的指使，谁能够在繁忙的公务之余，以每年一集的速度写出那么多饱含深情的诗？所以不管诗集谓何，他的几乎每一首诗作，都是他的“爱”的产物，是他对世界的种种“酷恋”与“苦恋”的“爱”的结果。这一点我非常欣赏，也以为此乃诗的正道！

《恋爱中的江南》，如果以此为书名，实际上与诗集中的题材和诗中感情皆相切合，老龚对江南，恋爱就恋爱吧，此乃实情。但经斟酌，他还是很“克制”和“低调”地去掉了书名中原拟含有的“恋爱”的意思。这是因为，这部诗集的主要内容都是写江南，正面地写江南，而且单是从“江南史鉴”、“江南物华”、“江南事典”、“江南情韵”等各专辑名，就能看出它是关于江南分门别类的较为全面的写作，有很明显的系统性。诸如太湖、虎丘、剑池、寒山寺、虎跑寺、梅家坞、桃花坞、乌镇、锦溪、沙溪、周庄、拙政园、网师园、沈园、张溥故居、郁达夫故居、西施故里、咸亨酒店和乌篷船等很多很有代表性的江南符号，诗集中都有丰富的书写。某种意义上，我们完全可以将《江南》看成是关于江南的诗性导游，是一部以诗的方式带领我们游览江南、感受江南的江南手册。

但是《江南》中的作品毕竟是诗，是一种以诗性的主体与伟大的江南进行对话的诗。龚璇的诗作，经常会出没一个特别的词，那就是“谁”。他很善于在诗意的展开与流转中，陡然提出凌厉的发问，引入一个不确定的主体、一个以“谁”来代称的主体。比如在诗集的第一首诗《石湖》中，他就这样写道：“天镜千倾，不见范蠡船舫/水鸟无栖/远见村舍疏落/楞伽寺塔的倒影/流觞，看月已是奇景/谁，对酒当歌/哪里更有清秋灵影，空守绣幔”；而在《剑池》中，他又曾有这样的书写：“夫差与勾践，争的是哪方领地/刀剑幻影，光怪陆离/如入太虚幻境/一块巨石，两字之下/沉埋千年古谜//谁赶早去看你，间缝中蓬乱的草象/斩断剑池的历史/谁为吴王，谁为越夫/水底躲藏的青蛙/无端皱襞”。在龚璇的诗中，有“谁”的诗句所在多有，再比如：“晨雾中，谁捧着一本奇书/道尽战争的诡谲”、“失踪的小鹿/为谁，呼唤古老的名字”（《穹窿山》）；“谁说置身事外，就能隐忍痛饮”、“谁，掌握着开悟的权力/却无法判断困扰的月光”（《梅家坞》）；“谁，攀着青石阶，不忍回头/青鸟鸣啭/一首送别曲，悲欣交集”（《虎跑寺》）；“孤香从哪里飘近。禅院的钟鸣/为谁而敲响”（《锦溪》）；“谁，敢于承受崩溃的雨/屋檐下，泥鳅跳出水盆之外/在湿润的道板上，尽染磨难的生活//有人担心。不宜扩张的景观旁/鹤发的人，谁还记得”（《咸亨酒店》）……龚璇的《江南》，还有他以往的作品中，有“谁”的诗句真的是不胜枚举。在我有限的阅读经验中，好像还没有哪一位诗人会如此频繁地运用这样的词，这样的运用，几乎已经构成了一个独特的诗学奇观，是龚璇区别于他人的独特的诗歌标识。龚璇对“谁”的运用激活和丰富了我们语言中一个习见的词。他让这个习见的词相当频繁地出没于诗中，承担着非常丰富的诗学功能。有时，它是诗人自我的外化或内在分裂，以此来呈现诗歌主体的丰富情思与自我追问；有时，却又指古人，是或者实指或者又虚指的诗作所歌咏与感怀的历史人物；很多时候，它则就是虚拟，是我们读者可以根据自己的阅读感受和江南情怀自由想象的不确定的主体……我们跟随着诗人，跟随着这个不确定的主体，出没于江南，漫步、徜徉，在江南的历史文化景观和自然与人情中进行深入的精神对话与精神交流，伟大的江南因此得以内在于我们，深深地内在于我们。这就是龚璇诗的成功，“谁”的成功！

和诗歌史上的每一位诗人一样，龚璇的诗中自然有“我”，有一个按他自己的说法“恋爱”着江南、“酷恋”着江南的抒情主体。江南处处，也许都留下过他的足迹，引起过他无限的感怀，但他的感怀，总体上又是忧郁的、内敛的，多有感伤。龚璇经常伤痛于历史，伤逝、伤情、也伤风景，克制与内敛中内蕴着犀利与勃发，甚至激烈，甚至旷达与豪情。比如在《张溥故居》中，他写自己“一个人，独步庭院”，凭吊历史——“巷口的古屋，沉寂多时/我来，又能找到什么/一片旧瓦的遐想/一枝腊梅的爱情/或者，一口老井悲喜的凭吊与瞻仰//门檐下，藏着暗淡的历史/有人不知经营/花枯萎、树落叶、悬挂的梦悄然消失/廊壁的楹联，锈迹斑斑/垂下沉重的记忆，夕光/焚烧尾部的沧桑”；而在《拙政园》中，他在书写了拙政园中的“嶙峋山石”、“分岔小径”和文徵明画堂中的“月光煎熬的忧郁”后，又这样来表达自我的情怀：“不论白天、或黑夜/盲人摸象，行走的地方/最需要阳光普照，月光挥洒一点点星光/已足以让我心明眼亮/窸窣声中，察觉每一处细微的动作/挑战徒劳的叹息//那一片紫藤，占有我的瞳孔/天空辽阔/返照事物的渺小。我不想成为蜡像馆里/凝固的肖像/也不求仙道，降我以大任/只把仁慈的目光/透过太湖石的缝隙，射穿/一山一水/一草一木的心事/直到落日后/势不可挡的宁静，重返石前的草地”。龚璇在经历一系列复杂的感怀后在他内心所降临的“势不可挡的宁静”，还有那些辽阔和晶亮的“光”，最让我欣喜。他在《上海，偏北》中写道：“上海，偏北。五十里外/还有一个人，安抚空寂的仓屋/吹灭灯火，遥望天际/突然发出惊讶的叹声——/你看，星空多亮！”上海，偏北，正是太仓，是他多年栖居之所在。龚璇栖居于江南，而又以他深厚的情怀抚爱着江南，抚爱着这片伟大的土地，江南因此有福了。

龚璇在《江南》和《恋爱中的江南》这两首诗中，曾经有过这样的发问：“江南，背负盛名”，可“谁，采集美妙的词语”，“咀嚼江南的秘密”？我想，这里的“谁”，恰正是龚璇这位江南的赤子。他不光自己沉溺于江南，还以他的独异的诗学——一种在语言中充分运用和成功发掘了“谁”的诗学，引来无数个确定的和不确定的主体，从而也招惹着我们，与他共同出没于江南，与他对话，与伟大和灿烂明丽的江南对话，他的诗歌因此多了复杂，江南也更加意味无穷。

（《江南》，龚璇著，上海文艺出版社2015年9月出版）